

大国崛起: 对外战略方针上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王 俊 生

摘 要 通过分析近代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崛起时在对外战略上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看到, 战略方针上, 中国应坚持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双重心, 且任何时候应牢记周边外交的重心与基础位置。战略措施上, 中国和平崛起不能完全排除军事手段, 要着重加强海外利益优化、公共外交、塑造与建立国际体系等措施。

关键词 大国崛起 历史经验 战略优化

作者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2012年11月底, 习近平同志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 “我坚信,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吹响了新时期中国崛起的征程。尽管每个大国崛起时因国家特性与国际环境差异等因素, 崛起之路无法复制, 但每个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又普遍有一些共性, 比如总要面对与处理霸权国猜疑、防范, 乃至遏制等棘手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研究英国、美国、德国与日本等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特别是那些在对外战略方针上的历史经验。

一、处理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的关系

在战略方针上, 所有崛起国首当其冲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的关系。崛起国站在崛起起点上时在实力关键指标上已成为所处地区最领先国家, 这时也是从地区向全球扩展影响力的开端。如何确立并巩固真正地区大国地位, 同时能成功扩展在全球的利益与影响力, 是每个崛起国在战略方针上首先面临的问题。

光荣革命后, 英国立刻开始了地区争霸, 巩固真正的地区强国地位, 并始终将其作为走向世界的基础。英国首先以全新姿态挑战

欧洲头号强国路易十四领导的法国的霸权, 为此连续投入两场战争, 即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 并取得巨大成功。以至于有学者称“路易十四王朝的辉煌时期结束于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①。此后英国开始经营欧洲以外地区, 但这一过程中英国始终通过力量均衡把主导欧洲作为基础。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势力均衡”称为和平的保证, 英国对大陆局势的时时干预则是维护均势的最重要因素, 维护均势的真正目的就是主导欧洲。随着走向世界, 英国确立了双向战略——“依据内政环境、外交猜测和战略机遇的变化, 时而偏向于‘大陆趋向’(continental orientation), 时而偏向于‘海洋趋向’(maritime orientation)”^②。“大陆趋向”与“海洋趋向”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英国时而积极干预大陆政治的最终目的在于为英国的海外扩张赢得一个稳固后方基地; 全力在海外开拓进取又在于增强英国应对欧洲危机、确保大陆均势的能力。

美西战争于1898年4月25日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两地爆发。由于美国海军实力远超西班牙, 美国迅速取得了战争胜利, 从西班牙

牙手中取得关岛、菲律宾以及西班牙的控制权。这场战争最大意义在于美国在对外战略上从孤立主义转向扩张主义，也即从地区大国开始向世界大国迈进。美西战争第二年，美国政府就先后向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开始在远东扩张。美国即使在向世界扩张时，也非常注重经营周边。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由于周边无强国的安全威胁，美国当时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加强贸易往来、直接投资的方式巩固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减轻周边国家疑虑。通过此举，美国逐渐使美洲变成其稳固的战略基础和支撑，保证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扩张时始终有一个充裕的后方安全环境。”^③

德国的崛起阶段分为俾斯麦时期和后俾斯麦时期。在俾斯麦时期，俾斯麦对德国的定位首先是欧洲大国，欧洲大陆形势对德国安全具有根本性影响，将其置于战略方针首位。1883年俾斯麦虽然调整在殖民地扩张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开始对外扩张，但实际上奉行“双重心”战略。其特点是：与德国在欧洲的战略需要紧密结合。确保不以德国的安全为代价。确保对整个海外拓展进程的控制（控制国内民族主义）。后俾斯麦时期，1897年德国在没有成熟战略规划背景下仓促推出“世界政策”：忽视了欧洲安全，法俄同盟的成立对德国构成了巨大安全隐患，造成与英国迎头相撞。殖民政策和海军计划与英国利益直接冲突。缺乏战略规划的世界政策四处出击，也加剧了其他大国对德国的疑惧和防范。英国一方面针锋相对的与德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另一方面与法国、俄罗斯这两个老对手调整关系，逐步形成针对德国的联合。1904年，英法协约达成后，德国开始面对英法共同围堵，其在欧洲的安全环境也迅速恶化^④。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英法俄联盟的实质性形成，标志着德国“一战”的

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于开战前就已注定了。

日本自1905年对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后，先吞并朝鲜，接着入侵中国。为了支撑巨大的战争开支，日本奉行“以战养战”政策，入侵东南亚。在亚洲仍陷入战争泥潭的情况下，又于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正式向美国开战。这也可视为在没有确定稳定地区地位的背景下仓促走向世界四处出击、最终走向失败的典型案例。

上述案例表明，每个大国在崛起时都意识到战略方针上有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两个重心”，也都遵循“先地区、后世界”的原则。但对这两个重心不同的处理方式，结局却截然不同。英国、美国、以及俾斯麦时期的德国都是在牢固确立与巩固地区大国地位的前提下才走向世界，而且即使在走向世界时仍始终奉行“双重心”战略。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则是在没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地区大国地位和没有处理好地区战略的背景下，就仓促走向世界，崛起失败。

二、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

至于崛起国如何处理与霸权国关系，四个国家也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17世纪中叶以期，西班牙是欧洲最主要大国，之后处于这一地位的是法国，法国也成为英国崛起时面对的最主要对手。从1689年直至1815年间，英国与法国的军事冲突几乎没有断过，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年战争时期。这期间除了为反对西班牙帝国收复意大利而形成四国同盟时期英法曾短暂携手合作外，在所有欧洲大规模冲突中，英法总是互相敌对。这也能反映出英法两个世界强国当时竞争的激烈状态。

1688年光荣革命后，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继承了英国王位。威廉三世自视为新教保护者，反对天主教的法国。法国则对试图夺取

英国王位的詹姆斯党提供庇护与支援。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后，英法敌对重心从宗教领域转向经贸领域，两国为争夺美洲和亚洲的控制权展开激烈角逐。奠定英国霸权的七年战争是其中最大、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冲突之一。英国这一时期虽然与法国为敌，但法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敌国却是荷兰、英国、奥地利组成的三强联盟。也就是说，英国在对付法国上虽采取战争手段，但却成功孤立了法国，争取到了当时欧洲其他强国的支持。为联合对抗法国，英格兰在这期间还与苏格兰、爱尔兰相继合并，奠定了今天英国的版图。

美国处理与霸权国英国的关系是采取“搭便车”战略，避免对其正面挑战。早在美国建国初期，政府内主流观点认为尾随在霸权国英国炮舰之后才能打开通向世界各地的贸易和文化通道。美国当时就确定了不正面挑战英国、力争与其维持良好关系，并等待时机将其超越的基本国策。后来“美国曾与英国发生过一次战争和多次冲突，也没有改变这一国策”^⑤。但在涉及其周边的拉美政策上，“美国积极调整对英外交战略，敢于并善于就核心问题坚守立场，从而使英国认识到美国在拉美地区扩展影响力的能力与决心，最终首先认可了美国在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地位”^⑥。这一政策使得欧洲列强在对待美西战争态度上，只有英国“偏袒美国，正是英国的友好行动，把美国从外交困境中拯救出来，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⑦。美国坚持不主动挑战英国霸权、等待其自然衰落后并逐步取而代之的另一原因很可能与当时已十分明显的美英权力转移趋势有关，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趋势已呈不可逆转之势。

德国与日本的教训较为类似，两国在崛起过程中分别充当了对英国霸权和潜在霸权美国的正面且孤独的挑战者。在俾斯麦时期，德国不断强调本国是一个“满足”的国家，

不谋求霸权^⑧。后俾斯麦时期，作为崛起国，德国滋生的傲慢及其国内高涨民族主义促使德国没有充分准备的背景下就正面挑战英国，这典型反映在其殖民政策与发展海军政策上。1898 - 1901年英德同盟谈判失败后，德国仍认为英国会更多有求于德国，“特别确信时间在德国一边”^⑨，对于英国数次提出的缓和关系请求傲慢拒绝，继续正面挑战英国。

早在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中国后，开始骄傲自大，过高估计自身实力。尽管经过明治维新，当时日本实力大为增强，但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征服中国的程度，更没有强大到能打败英美等传统大国的程度。当时日本对华全面侵略不仅遭到了中国强烈抵抗，而且与当时其他大国的利益也迎头相撞。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以后，日本扩张进一步危及美国在华利益，美日对抗加剧。1941年12月日军借口为了日本崛起要“打破一切障碍”偷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挑起太平洋战争，加速了其惨败。

案例表明，英国虽采取正面挑战法国的战略，但却成功建立起对法统一战线，孤立了法国。美国则采取不正面挑战英国的立场，在看到权力转移不可逆转时耐心等待英国霸权衰落。日德过高估计自身力量骄傲自大，采取正面挑战霸权国的战略，且挑战时遭到了几乎所有其他强国的联合围堵，可谓是自不量力且孤独的挑战者，最终失败在所难免。

三、多种战略措施的选择与运用

第一，战争手段。

从光荣革命到实现崛起，英国进行了多场战争。威廉王之战（1689 - 1697）结束到安妮女王之战（1701 - 1713）开始隔了3年；从安妮女王战争结束，到乔治王之战（1740 - 1748）开始，隔了26年；从乔治王之战结束到七年战争（1756 - 1763）开始，隔了7年。英国崛起75年间和平时间仅为36年。也

就是说，战争时间用了 39 年，超过一半时间都用在战争上。这些战争并非单纯英法争霸。部分与宗教有关，比如英国新任国王威廉三世视自己为新教保护者，反对天主教的法国。有些战争与欧陆各国的势力均衡与否密切相关，比如威廉王之战与安妮女王之战。有些战争则因当时欧洲各国王室间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与王位继承有关，比如乔治王之战。七年战争原因更是复杂，故土收复等交织其中。

美西战争后，美国将注意力放在拓展本国商业利益上，避免介入当时世界主要大国间的战争。在崛起过程中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却有“被迫”卷入的含义。1914 年 8 月欧洲陷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消耗最多的战争之中时，威尔逊总统表示美国必须保持中立，不能卷入欧洲“内战”。1916 年，威尔逊谋求连任总统时的竞选口号是“他使我们远离战争”。但随着德国动用潜水艇攻击过往大西洋的美国船只、甚至是客船时，美国人的反德情绪开始高涨。1917 年 1 月，德国外交大臣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出密令，要求联合墨西哥共同反美。密令被截取并公之于众后，美国舆论大哗。1917 年 4 月 2 日美国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 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美国在二战之初仍采取中立。随着日本侵占缅甸，越南，菲律宾这些被美国视为在亚洲的最大战略物资集中地，美国于 1941 年仅仅是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和冻结日本在美国存款。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南进派势力上台后以夺取东南亚为目标，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被日本视为最大障碍。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突袭珍珠港。12 月 8 日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二战。

1871 年后，德国在俾斯麦时期采取慎重对待战争的态度，以便让德国发展国力，没有再发动战争。在后俾斯麦时期，则采取冒险性军事战略。德国 1892 年提出庞大陆军法

案，1893 年进行帝国成立以来的最大一次扩军，其规模超过整个俾斯麦执政时期所有扩军总和。1905 年德国主动挑起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908 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和 1911 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继续采取了十分强硬和高度冒险的政策^⑩。

德国的军事冒险行为进一步强化了英法俄三国的合作关系。面对这种情况，1914 年德国领导人甚至希望借助最后军事摊牌一劳永逸的“打破包围”，高涨的民族主义对此推波助澜。并认为其对战争最有准备：这包括德军的动员速度快、连接边境的铁路已完工、打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重要航道也已然通行大型舰船。德国在英布战争中考察了英国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后，更认为德军装备和训练胜过英国。这种氛围下，德国最后由于盟国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冲突直接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断送了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之路。

日本在崛起过程中高度依赖战争手段。1910 年公然吞并朝鲜。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进一步明确侵占东北进而侵略中国与亚洲的大陆政策。1929 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加速了日本发动新的侵华战争。1931 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长达 15 年之久的侵华战争。1936 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决定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北南并进”作为国策。1941 年 12 月起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发动全面进攻。

上述可见，四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均经历了多场战争。英国与美国参加或发动的战争与日德发动的战争相比，后者明显以战争为实现崛起的工具，甚至依赖战争手段。英国参与或发动的战争，原因要复杂的多，宗教问题、王位继承问题，故土收复等交织其中。美国加入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有“被迫”含义。

2. 非战争手段

在非战争手段上，推动英国霸权实现的

主要是殖民地带来的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利益。一方面，星罗棋布的殖民地为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的行动提供了一系列便利基地，使其能更有效地执行远洋贸易护航、截击敌国商船和舰队并掠取更多殖民地的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当时英国经济与政治间的相关性已很强，甚至达到了“以商业立国”的程度^①。安妮女王1714年明确宣称，“本国的利益乃是通过贸易来壮大自己”^②，而殖民地对此贡献巨大。“1689-1774年间，英国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增长了5倍，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从1689年的15%增长到1774年的33%”^③。殖民地还是向英国提供贵金属、重要原材料和战略物资的产地，这使英国减少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更加独立自主与强大。

美国虽不以占领殖民地为手段，但在实现崛起的非战争手段上与英国十分相似，均注重通过商业扩张的手段发展壮大美国经济，继而获取经济主导权，在此基础上夺取世界的霸权。作为美国外交转折点的“门户开放”政策其要旨就是要与其他列强分享在中国贸易的权利。欧洲大国实力因两次世界大战遭受重创，美国还得以直接参与了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以及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缔造。美国的公共外交策略也十分成功。“一战”结束后，美国提出的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十四点计划”，对于当时世界的很多国家和民族、尤其是被压迫民族与国家具有很强吸引力。二战结束后，美国向欧洲输送的“马歇尔计划”对巩固其在欧洲的感召力也贡献巨大。

德国在俾斯麦时期，主要依赖外交上合纵连横实现崛起。俾斯麦的策略是创造“政治上的总体态势”，很快就与奥匈帝国等欧洲大国建立起一系列的同盟体系，使各大国彼此间关系都要弱于它们与德国的关系，每个大国都需要德国支持，而德国成为它们之间的“协调人”^④。这种复杂的、讲究平衡的战

略空间拓展措施使德国从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享受了整整20年“和平崛起”^⑤。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战略可用灾难来形容。俾斯麦的继任者，德国宰相卡普里维推行与俾斯麦政策大相径庭的所谓“新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法俄接近。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咄咄逼人且狂妄自大的扩张政策让英国也最终加入法俄同盟组成三国协约集团，共同对抗德国。

日本崛起时的国家政策被极端民族主义绑架，限制了其对外理性妥协。一旦有任何此类妥协，青年军官动辄就起来造反，将主事官员打死了事。这种氛围下，日本两任首相滨口雄幸和犬养毅也相继被暗杀。以1936年“二·二六”兵变为标志，日本法西斯全面上台，军部势力膨胀。最终在外交上，日本不仅和所有邻国为敌，还与英法美敌对。而英法同时还是苏联的敌人，日本可以说与敌人的敌人敌。几乎以全世界为敌的日本，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上述可见，在非战争手段上，英国与美国非常重视贸易立国。美国还特别重视公共外交、通过塑造国际体系来建立霸权。与之相对的是，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与日本在崛起时被极端自私自利的战略与民意绑架，走向了依靠战争掠夺财富，又利用新的财富发动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道路。

四、对中国崛起中外交战略优化的启示

上述案例表明，从战略方针看，由于大国崛起效应的地区与世界双重意义，外交上的“双重心”是本文所考察案例中所有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这也再次证明了习近平主席从“大国外交”一个重心向“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双重心转向的战略意义与历史高度。中国应坚持双重心。从本文案例看，“双重心”所带来的首要紧迫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两者间张力，不同的处理结果其崛起命运

大相径庭。这其中最宝贵经验是一定要在牢固确立地区大国前提下再放手走向世界，且任何时候走向世界时都应牢固确立地区大国地位。这表明，从现在起相当长时间，中国应持之以恒重视周边战略，海外利益拓展也应首先服务于确立与巩固地区大国地位。也就是说，若大约10年能实现这一目标，10年后在全面走向世界时也要时刻确立地区大国的基础地位。

从处理与守成国关系看，历史经验表明采取不迎头相撞的战略是正确的。如果要采取主动迎头相撞或不得不迎头相撞，就需要外交上首先成功建立起孤立守成国的国际联盟。这给中国两点启示。其一，在崛起时要继续恪守不主动与美国迎头相撞的战略；其二，在中国目前正在推动建立的各种新机制中，应尽量吸引美国盟友加入。对此经济收益需让位于政治收益。美国的经验还表明，在看到守成国权势下降以及权力转移的必然趋势时，战略忍耐与战略等待至关重要。如果不得不迎头相撞，上述案例还表明在其中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周边相关问题上中国应绝不妥协，比如美国在中国与某些邻国存在的相关领土争端问题上试图直接站到中国对立一面，对此应施加战略压力首先争取美国对中国地区权益的认可。

在战略措施上，四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均经历了多场战争。这暗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应、也很可能无法完全排除军事手段，但这肯定是中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竭力避免的事情。问题在于，如果不得不进行战争怎么办？战略环境表明，中国目前面临的不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是一个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高度体系化的世界。哪怕中国与周边某个小国进行的战争也很有可能带来极为负面的连锁反应。由于英美动用武力时是在破碎化的体系中取得成功，而德日动武则是在一定程度体系化的背景下失败，因此如何在高度

体系化的背景下动用武力又能取得成功崛起，案例并没有直接的启示。日德的教训表明，大国崛起依赖战争手段无一能成功。这如果参考英美对待非战争手段的积极意义就更为突出，这包括贸易立国、海外利益优化、公共交通、塑造有利于崛起的国际体系等措施，而在这些方面，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 Brooks Adams, *The New Empire*, Cleveland, Ohio: Frontier Press, 1967, p. 217.

② Daniel A. Baugh, *Great Britain's Blue - Water Policy 1689 - 181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1, 1988, P. 34.

③ 张爽 《美国崛起的若干历史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0期。

④⑧⑩⑭⑮ 徐齐郁 《德国崛起的战略空间拓展及其启示》，《当代世界》2011年第12期。

⑤ 孙力舟 《“韬光养晦”成就美国崛起》，《领导文萃》2013年第20期。

⑥ 陈积敏 《从国家独立到西半球霸权：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拉美政策》，《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4期。

⑦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⑨ A. J. Ryoler, *Twentieth -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ck to Brandt*.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60

⑩ 田德文 《英国崛起的政治文化基础》，《当代世界》2012年第10期。

⑫ Evan Luar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48 - 1815*, P. 219.

⑬ Walter L. 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 - 1763*,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3, P. 255.

[责任编辑：王道勇]